

#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12)

程早霞,姜华帅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清末民初出版业态的变革引发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实现了跨语境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传播者因政治立场和目标不同,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有差异。总的来看,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的要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因此存在“梯次传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孕育了新动力。

**关键词:**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传播;译介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1)06-0013-10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1.06.002

1899年广学会发行的《大同学》一书对马克思的主张有所介绍,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起始。1908年《天义》报第15期到第19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序言和第一章的内容做了较为完整的翻译介绍。此外,《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等文章对马克思及其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做了较为完整的介绍。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中产出了《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等研究成果。特别是近两年《马藏》<sup>①</sup>《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sup>②</sup>等典藏资料的出版,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目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文本的解读上,多是基于历史记载的表征性描述,系统分析和研究还不足。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跨语境转换

**收稿日期:**2021-07-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西方知识精英对中国西藏认知历史研究”(20&ZD238)

**作者简介:**程早霞,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姜华帅,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众传媒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①《马藏》中国编共四部。2019年《马藏》第一部出版,收录的是1894—1903年间出版的著作、译著类文献共28册,约合360万字。

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收集整理了1949年以前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重要著作中文版本,是国内第一套比较全面、系统地考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的大型主题图书。

和再造缺乏深度分析。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清末民初社会观念的革新和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研究不深。总的来看,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研究散落在各种文献中,通常都是学者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还未能系统呈现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整体脉络。

## 一、清末民初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国内出版机构和报刊爬梳

出版机构和报刊是推动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物质力量。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等出版机构及《东方杂志》《社会世界》《新世界》《民生日报》等报刊都曾参与过马克思主义传播。

### (一) 清末民初参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出版机构概观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其在国内的汉口、济南和广州等地成立了多家分馆,除此之外它还通过邮购处来销售图书,较早地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图书销售网络。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用长达20余页的篇幅对马克思作了介绍。另外,其创办的《东方杂志》仅1911年至1912年间就有《社会主义神髓》《社会主义商兑》等多篇文章涉及马克思主义介绍。广智书局在1903年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社会党》等多部与社会主义有关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被称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sup>[1]</sup>287-288,该书在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中对马克思的生平、主张和其创立的第一国际作了长篇幅介绍。《社会党》中也有多处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介绍,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各国社会党及拉萨尔等人的影响;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村社社会主义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情况也作了介绍。

### (二) 清末民初参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要报刊介绍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曾连载了高劳<sup>①</sup>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书中第三章称马克思为近世社会主义祖师,认为马克思所言的“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无不以经济上生产及交换方法为根柢”<sup>[2]</sup>道破了人类社会组织的本质。作者认为《资本论》一书对“如何经过诸种历史之阶级,以达乎所谓‘近世工业’之域”<sup>[2]</sup>作了详细的介绍。作者在文中将剩余价值翻译为剩余价格,称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无非从劳动者掠夺此剩余价格”<sup>[2]</sup>。书中第六章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和第一国际的情况,作者指出,《共产党宣言》详细介绍了阶级斗争的由来和宗旨,使社会主义摆脱了以往的空想,变成了科学的教义。

《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社会主义》等文章中对马克思及其主张也有所介绍,在《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一文中钱智修称马克思为“近世社会主义之开山”<sup>[3]</sup>;在《社会主义》中欧阳溥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一大宗也”<sup>[4]</sup>,并指出:“麦克司(马克思)所著资本论……纯用科学为根,极确乎不拔”<sup>[4]</sup>,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社会主义的一大进步,在文中他对剩余价值一词的含义也做了解释,称剩余价值为《资本论》一书的“精旨”。

《新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颇具贡献,其第1、3、5、6、8期连载翻译了恩格斯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今译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该译文翻译了原著的前两章及第三章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当时较为少见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整个著作文本的翻译。文中施仁荣将唯物史观翻译为“以物质思想观察历史”<sup>[5]</sup>,将剩余价值学说归纳为“以余利所得维持资本生产行

<sup>①</sup>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杜亚泉的笔名。

为”<sup>[5]</sup>,并称马克思这两大发明使社会主义“始克成为一科学”<sup>[5]</sup>,施仁荣因此也成为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两大核心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不仅如此,施仁荣还在文中多处提及马克思,使马克思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人物形象越发饱满。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书,能被《新世界》所译介和发表,充分表明了该著作在20世纪初的影响力,也彰显了《新世界》报人群体较高的理论水平。另外,《新世界》第2期还刊发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sup>①</sup>该文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部经典著作也做了介绍。作者认为当时德国社会党势力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原因在于马克思的思想精密、人格高尚和文辞敏妙。在绪论中作者还向中国社会党同志发出号召,希望大家学习马克思历经百难而不改其志的精神。

《社会世界》是中国社会党创办的刊物,旨在鼓吹社会主义。《社会世界》连载了译自日本《社会主义研究》的《万国社会党史》一文。《万国社会党史》在绪论中将资产阶级称为“绅士”,将工人阶级称为“平民”,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中“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sup>[6]</sup>,<sup>②</sup>作为介绍第二国际的引言。文中作者对第二国际及其内部马克思主义派与无政府主义等派别的斗争也做了介绍。在国内发行的报纸中,《民生日报》是最早完整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内容的报纸。陈振飞将《共产党宣言》中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翻译为《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民生日报》分七次连载了该篇文章。与民鸣在《天义》报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文相比,“陈振飞的译文更准确”<sup>[7]</sup>。

### (三) 清末民初出版物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名有几十余个

音译是翻译中常见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的翻译并不固定,有多个音译词。马克思有加尔马参、加尔孟古、加陆马陆科斯、加路麦古司、克豆麦鲁克斯、卡尔马格、卡尔马尔克、喀路麦罗古氏、喀路马路古司、楷尔麦克、马儿克、马尔喀、马尔斯、马尔克斯、马克思、玛尔克斯、致鲁玛培斯、致鲁玛古斯、麦喀士、麦喀、麦克斯、麦克司、麻克士、埋蛤司等多个音译名。恩格斯有安格尔、弗勒得力淹·格尔、因格尔斯、音盖尔、烟改儿士、烟格尔士、嫣及尔等多个音译名。1899—1912年间仅马克思在中国的音译词就有20余个,这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及其著作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五花八门的译名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始传播的不易。

## 二、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

### (一) 日本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中转站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发频繁,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日本兴起。因地理位置相近,又同属东亚文化圈,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中转站。1901—1912年间国内译自日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共16本<sup>[8]</sup>,其中资本、阶级和生产力等40多个马克思主义术语源自日本学者的著作。这些术语目前已成为我国现代语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幸德

<sup>①</sup>此篇文章是由朱执信翻译,煮尘(王缙尘)重新整理后发表的。

<sup>②</sup>此段话今译为:“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孙应帅、唐辉、杨雨林:《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70页。

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不仅在日本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还非常关注中国的情况,时常与避难日本的中国政治人物和留学生交流社会主义问题。幸德秋水曾与孙中山就社会主义的实现问题进行多次讨论;堺利彦曾在张继、刘师培等人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中发表演讲,提出要“改革财产私有制度,复为上古共产之制”<sup>[9]</sup><sup>325</sup>来解决当时贫富差距极大、资本家权势日盛等社会问题。

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日避难的政治人物和旅日留学生纷纷创办报刊介绍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在日本创办的中文刊物《译书汇编》《新民丛报》《浙江潮》《民报》《天义》等中文刊物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学理:共产党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序言》等多篇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章。孙中山、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人当年在日本期间都曾或多或少地谈及马克思主义。清末民初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有关的文章,多为旅日华人译自日本学者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日本转译的过程中有的术语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意义空间,出现了词义的扩大、缩小,甚至完全改变,这使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难以真正地理解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当时倾向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日本知识分子,大都信仰基督教,他们更多的是从自由、平等、博爱等伦理道德角度去解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偏离了原有的方向。三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在讴歌马克思主义、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时,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这使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解和传播社会主义时陷入了“空想”的困境,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构想脱离了中国实际。

## (二) 法国亦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重要信息源

1906年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巴黎发起成立了世界社。世界社创办的《新世纪》和出版的著作《近世六十名人》中都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新世纪》创刊于1907年,虽然其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但报刊中有多处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在《新世纪》第40号《记社会党、无政府党万国公聚会》一文中,作者介绍了当时流行于社会的三大党派:一致之社会党、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党,他指出一致之社会党源于马克思,并认为法国的鸠儿斯格斯德和德国的倍倍尔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

《新世纪》第44号《国粹之处分》一文中,作者称恩格斯(原文翻译为烟改儿士)为社会党成员,引用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待社会革命之后,此种种者当置诸博物馆与古之纺车、青铜斧并陈之”<sup>[10]</sup>的表述来表明其对国粹的态度。在《近世六十名人》一书中,作者对马克思的生平做了介绍,还收录了马克思1875年的一张照片,这是中文著作中第一次刊登马克思的照片。以李石曾为代表的巴黎新世纪派尽管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但他们在论述中有很多内容涉及了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分配原则,这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疑是有益的。

# 三、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 (一)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了多样图景

1.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贡献为不少学者所称赞。在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传播中,西方传教士、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近代报人群体都对马克思有过高度评价。1899年出版的《大同学》一书中,李提摩太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sup>[11]</sup>,在1903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梁启超又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鼻祖”<sup>[12]</sup>。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是近代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及其

学说的著作,书中有一章《加路马陆科斯(马克思)及其主义》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主要围绕《资本论》展开)。该章将近2万字,总字数约占整部著作的1/8。赵必振在文中称马克思为一代伟人,认为马克思“出无二之经典”<sup>[1]492</sup>、“创立新社会主义”<sup>[1]511</sup>,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达识译社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在第三章讲述产业制度之进化时,开篇即提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祖师”<sup>[13]17</sup>,并引用马克思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述作为引言。作为近代报人群体中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胡貽穀曾在《泰西民法志》一书中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称“民法志中之俊爽豪迈,声施烂然者,莫马格司若也”<sup>[14]78</sup>。

除书籍外,20世纪初《民报》《新世界》等报刊上也有许多文章对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在《民报》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朱执信讲述了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后不仅受到了政府的迫害,还受到了一般有势力者的非难,认为马克思要贤于俾斯麦万万倍,其学说“自今日视之,欲不宗师而尸祝之,其安能也”<sup>[15]</sup>。同时作者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sup>[15]</sup>。

1912年《新世界》第2期刊发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指出“马儿克者不啻全世界之造时势者”<sup>[16]</sup>,称其是当时社会主义流行、社会党势力澎湃的造就者。另外,孙中山在《社会主义派别及方法》演讲中将马克思与亚当·斯密进行比较,认为马克思是新经济学派,在分配中注重为多数工人谋幸福,反对资本家坐享其成,指出马克思所提倡的“劳动应得相当报酬之说”<sup>[17]34</sup>为世界学者所赞同。

《共产党宣言》在清末民初被多个传播主体译介到国内,并被给予了高度评价。《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从禁土地私有、课极端累进税等十个方面介绍了《共产主义宣言》的要旨,并称《共产党宣言》“既颁布,家户诵之”<sup>[15]</sup>。1908年《天义》报刊发的文章《学理:共产党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序言》中指出,虽然马克思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败北,其政治理想并未实现,但“马尔克斯之所见洵不谬也”<sup>[18]</sup>。此篇文章的最后加了编者按,认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sup>[18]</sup>,并指出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学者,应将《共产党宣言》作为入门书目。也有人将《共产党宣言》看作是“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sup>[16]</sup>,认为其是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分水岭。

《资本论》作为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被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所推崇和称赞。赵必振在《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称《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sup>[1]498</sup>;孙中山认为《资本论》使社会主义从“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sup>[17]5-6</sup>;江亢虎则称赞《资本论》“力翻经济学之旧案……拨云见天,其功至伟”<sup>[19]174</sup>。

2. 马克思主义在早期的传播也存在被改写、曲解和诋毁的情况。上文中我们介绍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称赞,但这只是其中一面,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播过程中也伴随着被改写、曲解和诋毁等问题。如梁启超尽管对马克思有高度评价,但他在思想上是多变的,他所撰写的文章中也有很多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攻击与诋毁。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由加拿大至纽约》一文中对美国社会主义党员有一段评价,认为他们像耶稣教人信奉新旧约那样崇拜马克思的著作,并且他们传播社会主义的方式也跟传教相似,他称“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sup>[20]</sup>。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对民生主义进行了攻击,认为民生主义“摭拾布鲁东、仙士门、麦喀(马克思)等架空理想之唾余”<sup>[21]</sup>,即使在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足以煽动下流,但终不可实现。

刘师培作为当时提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认为马克思所言的共产不是无政府制的共产,而是民主制的共产,会导致财产最终由国家组织来支配,并指出“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

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sup>[22]</sup>。江亢虎在《社会主义学案》中将马克思和拉萨尔视作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称:“其方法重在干涉,而其流弊近于专制”<sup>[19][174]</sup>。刘师培和江亢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尽管二者曾留学日本,但因当时日本和国内均没有系统化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评价。这些评价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 (二)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19世纪末中国最早出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零散介绍,并非传播主体的主动选择和规划,而是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救世学说的过程中夹带而来的。20世纪初的前十几年,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有意识地撷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派将马克思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帝国主义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助威;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性译介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学说,为本党派的革命运动做政治动员,为其政治理想找寻理论支撑;无政府主义者则是引用马克思有关国家消亡的论断来宣扬自己的无政府主张。作为不同社会群体在思想领域的代言人,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同,但他们使马克思主义从不为人知到一度成为大家争论的话题,无形中形成了传播合力。

尽管有传播者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做了介绍,但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行系统规划,也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道路选择,而仅是从观念上将其作为一种理论借鉴。选择性传播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进行取舍和选择,增强了传播的针对性和契合度;另一方面选择性传播也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不同步,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得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出现了“梯次传播”的现象。另外,有的传播者还故意混淆马克思主义与传播者本人政治主张之间的差别,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误读、偏离和失真现象。从传播的效果上来看,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引用、借鉴抑或是批判、非议,尽管有些内容偏离或者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但各个传播主体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翻译、选择和重构的过程中确实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三)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部分术语和理念的跨语境转换

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相关术语的翻译和译文的表达方式上有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印记。许多传播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术语时,并不是简单地采取音译的方式,而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意译的方式。如《大同学》一书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称为养民学者,将“科学社会主义译为‘养民学’”<sup>[23][46]</sup>;在《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中作者将“唯物主义”译为“格物”;胡贻穀在《泰西民法志》中将资本家翻译为积财者,将工人翻译为劳力者,用通俗的语言“积财者以剋减佣银而日富,劳力者以仅足养生而日贫”<sup>[14][314]</sup>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知之甚少,上述这些翻译在表达方式上贴近了当时中国的国情,用“养民学”“绅士”“积财者”这种意译的中文词汇更容易让人们理解和接受。

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像《民报》等报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时主要采用了浅近文言文的表达方式。文言文作为当时通用的书面语言,用它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在语言表述方面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阅读习惯,也使马克思主义在阐释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另外,1903年一部跟马克思主义有关的通俗读物《社会主义神髓》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社会精英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的作者幸德秋水少年时期曾读过汉学私塾,有较为深厚的中文功底。在文中他引用了不少中国名言警句和诗词典故。尽管此书是日文著作,但字里行间有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受“西学中源”的影响很大,许多传播者通过附会中国传统文化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有的传播者将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王莽改制”等制度视同为科学社会主义政策;还有的传播者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思想画等号,称共产主义为大同社会。这些传播内容虽然是一种误读,但当时“西学中源”的传播方式确实拉近了中西方思想文化之间的距离,更容易让知识分子产生心理上的认同。中国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对资本的功利性有所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有不少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及贫富分化等不公平现象的控诉,解读中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人文关怀。这种解读比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也为马克思主义从知识分子的书房走向劳苦大众的工厂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异域思想文化,在中国很好地实现了跨语境转换,得益于其在传播早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融合。

#### (四) 清末民初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人群体初步形成

随着出版业的发展,清末民初形成了一个以编辑、出版和发行报刊为职业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国早期的报人如王韬、蔡尔康等人从事翻译出版事业并非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更多是迫于生计的选择。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考取功名不再是知识分子的最优选择,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出版行业,通过编书、办报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围绕着《民报》《天义》《新世界》等报刊形成了多个不同的报人群体。参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报人群体,有着相同的身份和相近的思想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君武、朱执信和王缙尘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马君武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书目的第一人,他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中附录了26本与社会主义有关的著作书单,其中含有《共产党宣言》等5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朱执信被瞿秋白称为“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sup>[24]</sup>,在1906年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他还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了选择性介绍。朱执信是首位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十大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毛泽东和何香凝等人对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与马君武和朱执信相比,王缙尘不仅介绍马克思主义,还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论断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家里藏有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据他的亲属讲“他信奉共产主义,是全家人都知道的”<sup>[25]</sup>。近代报人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上述三位报人只是这一时期报人群体参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缩影。

###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 (一) 一些错误观点影响着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真正系统性地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极少,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作新社编译的《万国历史》中将马克思和拉萨尔的主张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认为二者“以国家之力,干涉商工等,平分其富,以均之贫民”<sup>[13]517</sup>。中国社会党也有不少成员认为马克思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党成员的殷仁,1912年因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与江亢虎分道扬镳,后来策划成立平民社会党,他指出“盖本党本经济之哲理……要不背乎国家社会主义家马克思(马克思)之学说者近是”<sup>[26]</sup>。张克恭在中国社会党创办的《新世界》中发表了《孙中山先生社会主义谈》一文,他在按语中指出马克思为“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sup>[27]</sup>。华承瀛则强调马克思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鼻祖,在《维新人物考》中他提出:“今各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以运动选举为作用纯然立一政党地位者

马氏为其元祖”<sup>[28]</sup>。从上面的表述来看,相关传播者显然并未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因《万国历史》是清政府学部审定的教科书,又加之江亢虎和刘师培等人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这些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

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既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把握上的曲解,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一方面学说的误读。在《大同学》一书中作者虽然介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以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斗争的内容,但“不得不出自有之权,用以安民救世”<sup>[23]457</sup>又美化了资本家的统治,偏离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1912年在中国社会党组织的演讲中,孙中山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称其主张资本公有。孙中山在演说中将机器视为资本,虽然阐述了机器(资本)应该公有的原因,但他并未深刻理解资本中所蕴藏的生产关系,也并未了解和把握剩余价值学说。欧阳溥存在《社会主义商兑》一文中通过靴子的生产涉及屠夫、锻铁者、耕种者等众多参与者来否定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社会财富不全是劳动者所创造,不应该完全归劳动者所有。这说明欧阳溥存并未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真髓,也不懂得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只是简单地将某一工种的劳动作为价值的来源。这些误读给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困难。

## (二) 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开启了先声

1. 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译介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本的部分篇章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本准备。清末民初的十余年间(1899—1912)马克思主义术语和核心概念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基础,诸如社会、资本和阶级等一系列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术语均是在此时期传入中国的。从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翻译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时并不是机械般地套用,而是结合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术语和核心概念进行了意译和话语重构,在表达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可以说翻译的重构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契合中国当时的语境,让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术语逐渐融入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道路选择。

2. 促进知识分子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等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和救国图存的现实召唤,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个体觉悟到群体觉醒。清末民初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现实危机,传统知识分子因国家主权的沦丧、异域文化的传入等影响,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物,从力图改变社会的理想者逐渐变成革命的主体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领军人物,孙中山、廖仲恺和宋教仁等人纷纷译介与传播马克思的有关著作。据宋庆龄所言,孙中山在19世纪末旅欧过程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及其活动就有所了解,他还“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sup>[29]</sup>。

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和观点经报刊、党派和社团传播后,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得到了启蒙,促进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变革力量的整合,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汇聚了主体力量。《马藏》第一部在评价《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对李大钊、陈独秀……杨匏安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都产生过巨大影响”<sup>[13]68</sup>。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既开启了民智又做了革命的政治动员,特别是革命话语的传递起了社会动员作用,助推了清末民初革命浪潮的兴起。

3. 推动社会观念的革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内容传入国内,使中国封建社会中“天命论”等唯心史观无法照旧演绎下去。朱执信等人在译介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时,不是简单翻译,而是做了较为深刻的剖析。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和《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两篇文章中均有涉及阶级斗争学说的介绍。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sup>[15]</sup>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文中朱执信还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归纳为“禁私有土地而以一切地租充公共事业之用”<sup>[15]</sup>等十条内容,并称这十条内容体现了马克思力图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救苦难群众。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中朱执信不仅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还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强调在革命过程中人民群众不可或缺。他指出:“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sup>[30]</sup>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重要来源,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觉悟,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播既是一种思想的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其思想中蕴藏的自由、平等等观念对改造国民文化观念具有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传播者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陋习进行了批判,并力图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观点构建一种新的,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新文化观念。《天义》报主要创始人之一何震,是近代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她的主导下《天义》报曾刊发了多篇与妇女解放有关的文章,有的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佐证自己论述的正确性。1907年《天义》报第十三、十四卷合刊刊发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中,作者指出要实现女子革命,必先要从经济革命开始。作者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还附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部分内容,他认为马克思所言的“资本私有制度消减,则一切公娼、私倡之制自不复存”<sup>[9]205</sup>是探源之论。1908年《天义》报刊发的《女子问题研究》通过翻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内容再次强调“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sup>[9]499</sup>。《天义》报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女子解放结合在一起,冲击了封建社会的男权主义,推动了人们传统观念的革新。

## 五、结 语

甲午战争以后,清朝的帝国权威丧失殆尽,在思想领域方面的管控和影响已大不如以前。马克思主义在此时传入中国,助推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第一次传播热潮的到来。马克思主义术语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单元,已开始融入中国的语言文化体系中。资本、阶级和共产主义等几十个马克思主义术语均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当时的知识精英对这些术语进行了意译和话语重构,在表达中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要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sup>[31]</sup>,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链条,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尽管影响范围主要在知识分子内,但其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马藏第一部:第2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 [2] 幸德秋水. 社会主义神髓[J]. 高劳,译. 东方杂志,1912(12):5-10.
- [3] 钱智修. 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J]. 东方杂志,1911(6):1-10.
- [4] 欧阳溥存. 社会主义[J]. 东方杂志,1912(12):1-5.
- [5] 弗勒特立克恩极尔斯. 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J]. 施仁荣,译述. 新世界,1912(6):12-15.
- [6] 万国社会党会史. 译日本社会主义之研究[J]. 社会世界,1912(1):82-83.
- [7] 邱捷. 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刊载的《共产党宣言》译文[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63-75.
- [8] 方红. 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传播[J]. 外语教学,2020(5):94-98.
- [9] 万仕国,刘禾. 天义·衡报:上[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0] 佚名. 国粹之处分[J]. 新世纪, 1908(44):1.
- [11] 梁启超. 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J]. 新民丛报, 1902(18):33-44.
- [12] 梁启超. 二十世纪之巨灵: 托辣斯: 续前号[J]. 新民丛报, 1903(42-43):110-132.
- [13] 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马藏第一部: 第4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 [14] 卡卡朴. 泰西民法志[M]. 胡貽穀, 译.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2.
- [15] 势仲.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J]. 民报, 1906(2):13-28.
- [16] 势仲, 煮尘. 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J]. 新世界, 1912(2):13-28.
- [17] 上海三民公司. 孙中山社会主义谈[M]. 上海: 上海三民公司, 1926.
- [18] 民鸣. 学理: 共产党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序言[J]. 天义, 1908(15):19-26.
- [19] 汪佩伟. 江亢虎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20]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 由加拿大至纽约: 续[J]. 新民丛报, 1904:92-137.
- [21] 梁启超. 开明专制论: 续第74号[J]. 新民丛报, 1906(4):7-56.
- [22] 姜义华.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432.
- [23] 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马藏第一部: 第1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 [24] 瞿秋白. 瞿秋白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340.
- [25] 王炯华. 煮尘与民国初年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附煮尘其人[J]. 浙江学刊, 1987(6):11-15.
- [26] 皮明麻.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143.
- [27] 克恭. 孙中山先生社会主义谈[J]. 新世界, 1912(4):22-35.
- [28] 树清. 天津最早介绍马克思的书——《维新人物考》[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83(1):53.
- [29] 孙应帅, 唐辉, 杨雨林.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8:74.
- [30] 县解.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J]. 民报, 1906(5):43-66.
- [31] 董志新. 毛泽东品《庄子》[M].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5:89.

## Study of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99—1912)

CHENG Zaoxia, JIANG Huashua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publishing forma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ed to some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deologies and cultures. During this period, Marxism was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into China. Japan and France were two important channel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fragmentary translation to selective transmiss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some Marxist terms was cross-context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urce terms. The early translators and introducers of Marxism differed in their choice of the content based on their political stance and goals. In general, the doctrine of class struggle and the doctrine of political economy were translated earlier, so there was a phenomenon of “laddering” in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promoted the awakening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forces of social change in intellectuals, providing the ideological impetus for the change of the historical destin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Marxism;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